

曾勝賢先生

訪談紀錄



曾勝賢，一九四四年出生於屏東東港，自小即有台灣意識，且敢於反抗國民黨。因家庭經濟因素與對法律的喜好而報考軍校，一九六四年就讀於秀朗橋頭的軍法學校，一九六八年畢業（同一年，軍法學校遷離，改為警總軍法處及國防部軍法局）。畢業後，曾勝賢經軍法官考試及格，擔任台北師管區司令部額外軍法官，於軍法處代理書記官。期間因將當時重要案件的起訴、判決書取出轉交魏廷朝，遭牽連入獄，一九七一年以「預備以非法之方法顛覆政府」之罪名，處有期徒刑五年，褫奪公權四年，曾被關押於保安處、警備總部、景美軍法處看守所、綠島、生教所等地。具有軍法官背景的受難者，在白色恐怖歷史中殊為罕見。曾勝賢在景美軍法處看守所期間，長時間遭單獨囚禁，精神受到極大壓力，一九七五年七月出獄後仍被長期跟監、騷擾，因為厭惡政府作為，曾與相關單位談判。解嚴後曾申請平反，並聲請大法官解釋，但遭到駁回，日後仍會繼續爭取。

自我意識強 現實逼迫報考軍校

我是屏東東港人，小時候就聽父母說二二八的事，對我影響很大，到國小時，有同學的父母晚上被捉走，捉到哪也不知道。我爸爸很早就過世了，小時候我們兄弟要靠自己，長輩常說：「唐山人不可靠，要靠自己。」所以現在有人問我是哪裡人，我說：「我是三地門的人，我祖先就是三地門酋長，我阿公不想做，跑到平地生下我父親。」其實就是胡說，我就是台灣人，不是你們所說從大陸來的，你若跟我說祖先從大陸來我也不信呀！因為我不知道大陸祖籍在哪，我在台灣生長，為什麼要去追？那對我有什麼好處？沒好處去追什麼？本來就是自我意識，我在說這些時，我哥哥在旁邊竊笑，我死也不承認我是從中國來的，台灣長大的人，幾代都在台灣了，還要考慮自己從哪裡來的？

我一向對國民黨政府沒什麼好感，從小就和他們對抗到大，讀書也被退學、也打架，得罪了教官，也不用讀軍校。我性格就有那些因子了，也是因為我哥哥在從事反抗的事，他的一些朋友都在寫反動文章。都是有意在進行的，那時也沒考慮自己會生會死，因為生活也不好過，對不對？我說實在的，我當軍法官一個月領幾百元，所有錢都寄回家裡，自己沒留半毛錢，所以說，要生要死也不要緊，我也沒娶妻，翻身就翻身，翻不了身就……。

我高中就開始看反動文章，《文星雜誌》、《自由中國》半月刊什麼的啦，都是很特別的書。被抓到當然不行，我們會偷偷看，那時牯嶺街有在賣，放假就去買一本來看。當然我不敢自己一個人看啦，高中同學都有在看，偷偷的，不敢公開看。我讀軍校後，他們上大學在外面工作，調查局也抓得很緊，只剩下我一個。

我會讀軍校有兩個原因，第一個原因，家庭無法支持兩個小孩讀大學，我哥哥讀淡江文理學院，我就沒辦法讀大學，經濟無法負擔。第二個原因，因為我哥哥有一個結拜兄弟，他是有錢人，後來讀東吳大學法律系，我心想：「要讀就要讀法律。」所以我放棄大學考試去讀軍校，即使是軍校，我也要讀軍法學校。那時有三軍官校、政工幹校，法律只有軍法學校，當時是獨立的，要高中畢業才能考。一樣要聯考，五院校聯考，就是測量學校、理工學院、國防醫學院、軍法學校和財務學校，政工幹校排除在外，它們單獨招生。我是民國五十二年（一九六三年）九月還是十月去台中車籠埔，接受入伍教育四個月，算是基本程序，之後就分發到各學校，民國五十三年（一九六四年）一月回來景美上課。

我們是冬季班，第七屆的學生，民國五十七年（一九六八年）畢業，畢業時在景美考畢業考，考後遷往復興岡，景美那邊交給軍法局及警備總部軍法處。在軍校第四年，學校一直叫我參加國民黨，我都不肯，直到畢業前三個月，他們威脅我如果沒拿到黨證就要馬上開除，我想那一切不都白費了！那時就快要畢業，於是我就答應入黨。我從沒去開會，「黨」長成怎樣也從來不知道。民國五十七年一月考試完，軍法官放榜，大概三月回來實習，實習三個月，仁愛樓也蓋好開始關人了。我分發回到警備總部軍法處，教室變法庭，學校變成看守所。

親眼目睹槍決 數日食不下嚥

軍法官實習時我曾經看過死刑執行，都在清晨五點，清晨三點半我們就被叫起床，說是槍決見習。從確

認死刑犯身分到押送往新店，東南西北，台北師管區、台中師管區、台南師管區、花蓮師管區的人都要在場，我們四個實習法官也都在場。情況大概就是，宣讀那個死刑犯二條一，判匪謀罪，凌晨三、四點叫死刑犯起床，驗明正身，從押房拖出來到法庭，在法庭檢察官訊問，驗明正身，我們實習的人會在法庭出現，在那裡觀摩。酒和麵包都放在死刑犯面前，吃或不吃都可以，問完之後就綁，五花大綁，綁到身體都不能動。劊子手這時候就來了，押上車之後送到刑場——新店安坑。我們一路跟著，到達的時後，檢察官跟我們見習的都在旁邊，外圍都有人站崗以及一個劊子手，那一次補了五槍人才死。打到他沒呼吸，檢查證明人已經斷氣了，我們才離開現場。這一段執行的人如果沒說，沒人會知道。我看過那一次之後，好幾天吃不下飯。

本土反骨性格 升遷受阻

民國五十七年（一九六八年）七月，我分配到桃園台北師管區當軍法官，民國五十九年（一九七〇年）六、七月，又把我借調警備總部本處當代理書記官。我那時是中尉，上尉一直升不上去，雖然成績我最好，但是我的資料不好，從小到大反對外省人、和他們吵鬧打架。我的不滿也可以說是父母種下的因子，我自己親身的體驗也是這樣，他們那些中國人都占得到缺，只有我一個台灣人沒有缺，全警備總部就只有我一個，我們那一屆的前後期都有占到缺。

在師管區時，只有一個外省人，其他三個都是台灣人，周啟同、蔡籐雄跟我是台灣人，另有一個劉衡慶是外省人，他們變動很快，升遷也很快，我還是中尉時，他們都是上尉了，如果有人要提拔我，就被軍法處

長范明擋住。直到後來有一個藍組長，他升上來當組長，才調我幫忙。軍法處對我都很好，我就到軍法處暫時代理書記官一段時間，在那裡，還是領軍法官的薪水，本俸三百六十元，還有一個軍法官加給，一個月領七百二十元，代理書記官半年，然後又回到師管區。

因案牽連身陷囹圄 政治凌駕法律

我是從台北師管區軍法室軍法官，調去警備總部軍法處，先代理書記官，之後因為有幾個案件，我把起訴書、判決書拿出來，送給我一個朋友林順益，他再拿給魏廷朝。大概因為是一些重要的案件吧，因為魏廷朝在民國五十九年（一九七〇年）被抓，我的朋友和我哥哥都被牽連進去，連我也牽連，所以我變成是很特殊的一個政治犯。

那時代理書記官半年，又回到師管區，沒兩個月就被「請」走了，他們說：「處長要跟你說話。」藍組長在車上跟我說：「唉！你怎會做這些工作？」我說：「什麼工作？」那實在很不光榮，說要抓我就好，騙我說處長要跟我說話，根本不是，直接送我到保安處。藍組長很關心我，跟我去保安處，告訴我：「不要煩惱，不會對你怎樣，都有交待。」民國六十年（一九七一年）四月一日愚人節，他們把我「請」到警備總部保安處，因為大家以前是同事，所以沒有動刑，說實在的，他們有交代會有疲勞轟炸，事先有提醒我。當時要判一個人死刑或無罪，是上面打電話、下條子，不是經過他們對法律的見解決定的。所以當時反情報隊隊長，我記得很清楚，他叫做陳輝嚴，他跟我說一句話：「小弟，今天談的是政治，不是法律。政治第一、法

律第二。」我說：「這麼講的話，把我送回去房舍裡面，不要出來問好了。中華民國憲法、法律早應該丟掉了。」我沒辦法，把我打死也是這個樣子。

我跟他說法律依法論法，他就是要說政治，不談法律。因為他們用機密、叛亂都判不了我，遂說我和魏廷朝一起，是一份子。他們也是聽上面的反應，其中有人也跟我說：「學弟，不好意思啦。」我的情況是沒有實際的證據在他們手上，他們直接把我關到臥龍街，關了五、六個月，保安處跟我說沒事了，結果警備總部反情報隊又把我請過去，關在警備總部裡面，就在現在地方法院前面，愛國西路跟博愛路交叉口那裡。我真的被政治處理，到哪都自己一人關一間。在那裡關了兩個多月，才把我送來景美警備總部軍法處，韓延年檢察官，審問一次而已，就把我起訴，他是我們自己的學長呀，也對我搖頭。法庭這裡，起訴後沒多久就審判了，聶開國當審判長，隨便問一問，他問我對起訴書有什麼意見，我說：「我再說也沒有用，你說也沒有用，對不對？」他說：「好，沒有答辯，定讞判決。」

那時來景美前，反情報隊隊長和保安處處長原本都保證沒有事，結果，上面不打算讓我走。判決在景美這裡判，判決書在審判一段時間後送到押房給我，我看判決書才知道判五年。

我這個案子，抓了兩百多人，我哥哥他們都釋放了，其他皆有成案。起訴後就放人了，表示有人控制，不能亂來的，之後剩我們十幾個，比較特殊的是我和洪武雄¹。反情報隊隊長告訴我，本來我也在要釋放的範圍內，但是上面一個命令說不能放，就沒放。其實抓了兩百多人都沒證據，那些反動文字，如何證明是他們寫的？就是用一個咬一個的方式，我的朋友把我供出來，我才不得不承認。

單獨囚禁險發狂 念書排解心中苦

他們把我單獨關一間房，我記得我那個房間很大間，跟別人不一樣，我剛開始一個人在這裡，會怕，發生什麼事都不知道，可能是要讓我發瘋。因為沒人可說話，幸好我愛看書，裡面書不多，我很快就看完了。進來差不多兩、三天，隔壁的人敲牆壁，一個年輕人，陳先生，二十幾歲，他自稱是紅色的（共產黨）被抓進來，他敲我牆壁，我原先以為是瘋子，關到瘋了才敲牆。但是他叫我看看牆壁，居然傳遞紙條過來，從那時開始，我就開始寫紙條，他敲牆壁我就跟他說話，但是理念不通、路線不同，只是互相聊天遞紙條，看完都要立刻撕掉，不然會來查房。

當時我在景美就是讀書、念書，把自己當成瘋子在這裡念。那時人少，我印象中記得我都是一個人放封，會有一個人帶我下來讓我放封，時間到了就上去，中途會經過我們同排牢房，下來後在放封區，時間很短，只有十五分鐘，不像綠島都是三十分鐘。因為我一個人一間，所以放封也只有我一個人，就在這邊走來走去，衛兵在旁邊監視。差不多十四分鐘他就叫你進去，要想做什麼事情也沒辦法，就盡量享受，把這十五分鐘當成我的天下。放封也不是天天有，雨天就不能出來，平均兩天放一次，一次十五分鐘。政治犯關在這裡也沒有比較特別，反而特別嚴格，我覺得在這裡生活比綠島痛苦，至少綠島人比較多，我在這裡單獨一個，所以覺得關在這裡會發瘋，因為沒人說話，我當時還在想：「出去我還會說話嗎？」

1 洪武雄（一九四二—），彰化縣人，台北市大安分局安全組警員，涉「洪武雄案」（一九七一年二月間，彭明敏逃亡海外仍繼續從事台獨運動，受命跟蹤謝聰敏，但隨即將跟蹤消息及機密告知謝聰敏），一九七一年以「包庇叛徒罪」罪名，處有期徒刑十二年。

同房獄友說歷史 泰源事件留見證

在景美我待到民國六十一年（一九七二年）三月還是四月時送到綠島，在這之前，有兩個老人進來跟我住，比較早進來的姓洪，後來又來一個姓鄭的，鄭先生書法寫得真好，不過他的名字我忘記了，洪先生跟我關得比較久，有四個月，因為他是閩南人，跟我說台語，有洪先生進來我的日子過得輕鬆多了。他說二二八的故事給我聽，因為他是負責接收台灣的，泉州人，所以他把陳儀如何治台？二二八怎麼發生？彭孟緝在高雄如何打台灣人？這些歷史都告訴我。

二二八事件我小時候聽家人說，不太清楚，洪先生從阿婆的煙攤被推倒說起，到在台北市看到人被踹下水溝的恐怖，都說給我聽。他歷史說完，就教我作詩，所以那段時期快樂多了。他說二二八事件的時候，因為他會說台語，沒人當他是外省人，只要看到外省人，台灣人都過去打，因為外省人說話有口音。至於二二八打私菸攤阿婆那個人，也有被關入監獄，以「為匪宣傳」判刑七年。

我們三個人關在一起的時間只有一個多月而已，之後就換房了。關到另一間，人又不同了，雖然是不同的人，但和我在一起都是老人，關一週左右就走了，因為不讓你多想，他們就不停的調房，十幾個人一間。我覺得奇怪，我本來是自己一人一間，為什麼一直調動，而且都不認識的人？以我的觀點，關在景美軍法處的應該全部都要過去綠島了吧。

去綠島的前一個晚上，我認識了鄭正成²。那時我聽說，鄭正成是泰源事件僅存的一個人，我便問他泰源暴動是怎麼來的？他對於泰源事件的策畫、策動，沒說太多，他提到施明德也是策畫者之一啦，但是行動

後他就退縮了。我又問他：「你能不能說為什麼你們這個事件，只留你一個？」他說：「他們留我下來當見證。」他們那些人把罪都扛下來，都說不干鄭正成的事：「他沒參加，是我們硬逼他走的。」所以鄭正成沒死，最主要是他們幾位替他扛罪，要他當見證。那些人很有氣魄，年輕嘛，事先就說好的。鄭正成說他們都承擔，所以他成為共犯，判十幾年，但是沒死。我說：「你又多判好幾年。」他說：「對啊，我知道啊。我能出去還是沒出去都沒關係，最差也只是這樣而已，不會比現在更差了。」

綠島時期勤讀社會、哲學、思想史

從景美送往綠島時，那時我們是第一批到綠島的，綠洲山莊才剛剛建好，泰源的人先過去，台北看守所這批人才過去。到綠島時差不多是早上九點多，到的時候才聽說那是新蓋的，坐卡車從大門進去，大家都蹲在廣場，等待配房。分好房就進去了，我記得有呂國民、楊渭溪，我都叫他楊老，還有一個外省的，他共產主義意識很強，住左營。另外就是賴先生和一個和尚，我們那間房七、八個人，在進去右手邊第一間，前面就是之後的公共浴室。

我們的對面也有一間押房，通道左右邊都有，直到移到生教所前我都在那間，其他的政治犯，只要二十年以上的都當外役，和我們關的地方不一樣。他們是泰源來的，關在一起，我們在左邊，他們在右邊。

2 鄭正成（一九二八—），台北縣人，上等駕駛兵，涉蘇東啟案，一九六三年九月廿五日以「意圖以非法之方法顛覆政府而著手實行」罪名，處有期徒刑十二年。一九七〇年涉「泰源監獄事件」，處有期徒刑十五年六個月。

我對綠島的印象是放封的時候可以跟大家在一起，給了一點自由，大家可以互相聊天，在那裡算過得很快樂，我們彼此會互相傳授像是太極拳，或者是運動，又或者偷偷說悄悄話，不敢大放厥辭，一天一次，每次半小時，最多四十分鐘。放封都在早上八點到九點開始，我在綠島兩年，不會太熱或太冷，有海風。所有時間都用在看書，在裡面看的比在外面還多，在裡面借書，像是中國思想史、中國社會史、中國哲學史、西洋哲學史、西洋政治思想史，差不多都精通。

減刑移送生教所 維持低調至釋放

從綠島離開，有減刑的問題，臭頭仔（蔣介石）死後，我被移到生教所。他死的那天，沒有動靜，都很安靜，之後只提到有一部分人要送生教所，那些人是成績好，要減刑的，原因當然是因為臭頭仔死。我那時關了四年，又回到生教所待九個月左右。那裡都在教三民主義，像馬璧、丁迪，馬璧原本就是政工幹校教官、教務主任、教務長。我們那天要準備釋放，一定要有

The image shows two historical documents related to the case of Zeng Shengxian (曾勝賢). The left document is a 'Table of Reduction' (減刑表) with columns for 'Case Name' (案名), 'Original Sentence' (原刑), 'Reduction Reason' (減刑理由), and 'Reduced Sentence' (減刑後). The right document is a 'Reduction Case File' (減刑案卷) with a header from the 'Taiwan Police Bureau' (臺灣警備司令部) and a date of '1946' (中華民國三十六年). It includes a stamp that reads '曾勝賢叛亂減刑案卷' (Zeng Shengxian Rebellion Reduction Case File).

保存在檔案管理局的公文有關於曾勝賢減刑的資料公文。
(國家人權博物館籌備處提供)

保證人，我和另一人沒有保證人，都是林敏生找人來保的，因為他是律師，我們在生教所處的不錯，他判感化的，後來找他家人保我。

從綠州山莊到生教所，不少人，有一、兩百人喔，監獄了不少人，只要是輕罪的都移到那去，像是判六年、七年的差不多都移去，楊老關到快出來了，裡面最年輕的可能是陳信銘，他才高中就被抓了。陳信銘曾出來選新莊市的市長還是鎮長，民進黨提名，和我同時到生教所，從綠島到生教所，跟我關不同地方，我很不喜歡和他們分紅、白爭執，很不喜歡，說真的，我是身分特殊的人，他們不知道我這個人是真是假，所以我也不愛發表任何言論。其實很簡單，若我是國民黨派去臥底的，我就不用那麼痛苦關在特別的押房。

遭跟監困擾多 不屈不撓闖出生天

剛出來時我去一間律師事務所當助理，調查局的常恐嚇律師，叫他不要雇用我，律師說：「那是你家的事，與我無關，我雇用就用了，他如果犯罪，自己負責。」那個人是黨外律師，范振星，原本我也不知道他被恐嚇，直到有一次法官們在聊天時我在場，律師說：「你要進來都沒說你的身分？」我說：「我說了身分你一定不敢聘我。」我在那裡一段時間，和桃園法官也很熟，范律師和法官關係也很好，這件事情他叫我去和法官談，我得知他被威脅後覺得這樣不行，感覺很不好意思。

聽到恐嚇這件事後沒多久，我打電話給調查局的人，叫他們派人到我家跟我談，他們問我什麼事？我說：「來就對了。不然叫跟蹤我的人跟我談也可以。」他們來了，我就說：「你們是什麼意思？要我再跟你

們拚一次嗎？我沒差呀，單身一個就不怕你們了，雖然現在娶了老婆，也有小孩，但是沒關係，他們可以自己生活了，我太太、小孩不靠我生活，你們這樣四處阻擋做什麼？我告訴你，你回去跟你們主管說，我隨時準備兩套內衣褲，必要的時候，再拚一次。你們跟監我，我已經很可憐了，還去我老闆那裡！」他們說：「不會啦，以後不會。」

我在那間律師事務所差不多一年，他們跟監地點就在房子的前後，我出入的時候他們都一清二楚。

我太太在做會計，碰巧在台北，我初中的導師介紹我去台北一個朋友開的律師事務所，要我管理，那裡面都是情報人員，事務所只是掩護，然後介紹了一個叫樊明新的人給我認識。我的老師也知道我的處境，因此對我很好，既然我沒有工作，去那裡是最妥當的。

政府逼到我無法工作、生存，後來我自己出來做代書，需要律師執照，但是我沒有，之後有人介紹蕭顯忠律師，他的牌就掛在我那裡，我當時在桃園，他沒地方掛牌，我借地址讓他掛牌，然後我做代書。我有案子就給他，我們合作，最後再看要分幾成，到現在我們都還有聯絡。

巡邏箱 查戶口 跟監「保護」十七年

民國六十四年（一九七五年）我從土城出獄後，特務跟監跟得很煩，我當時在桃園買房子，一樓租人，二樓我們夫妻自己住，小孩一個我們自己帶，一個我媽媽帶，晚上再帶回來。我的房客跟我說：「曾先生，外面怎會有人往內看，我會怕！」我說：「不用怕，他們在保護我們。」一直到民國八十一年（一九九二

年）還來跟監，不管我搬到哪裡，旁邊就會有一個巡邏箱，所以有時候鄰居會問：「你沒來的時候，警察都不會來這巡邏，你來時為什麼警察都會來？」我說：「第一、不會遭小偷。第二、我的安全你們都不用怕，沒人敢動我，我是特殊人物，所以要派人來巡邏。」我是身歷其境的人，我的鄰居認為我在說笑，我說：「不然你問住我們前面那個三線二星的。」我們附近還有一個二線的，樓上還有情報局的，我說：「你問他們，我是不是比他們重要！」

我被跟監時，永和住的三十戶中就有三、四戶是情報人員，我太太會和他們聊天，我一回家就不和鄰居來往，某天我突然發現：「奇怪，怎麼有巡邏箱？」而且發現他們都趁我不在家時來查戶口。

我太太也告訴我：「突然來查戶口，怪怪的。」我有個朋友是安全局的台南專員，他是蕭天贊的外甥，他來問我：「你家有人在跟監？」我說：「我是不知道啦，我家前面為我放了巡邏箱，常有人在那走來走去，不知道是誰。」結果他跑去查，因為國家安全局專員可以查，他也去問他的姑丈蕭天贊，請他派人去查，調卡片出來看：「咦！？這個人怎麼還在跟監？還在『保護』中，這不對，應該撤掉。」所以他向安全局長宋心濂報告，最後請法務部撤除，在那之後才撤掉我家這邊的巡邏箱。

被跟監最明顯的就是民進黨組黨那天，有四、五個警察到我這裡，看我不在，有沒有參加，那天小孩參加運動會，我沒辦法走，遇到他們只好向他們說笑：「長官，我人在這裡，沒走，放心。」我也不知道民進黨那天成立，所以我就問：「你來這幹嘛？」他說：「沒有啦，來走走。」「走什麼？」「你要出門？」「我要去哪？」「沒有啦，民進黨……」我告訴他：「那是你家的事。」很多這種類似的情形，有形無形中讓你感覺到。

不只這樣，連中美斷交也要找我，叫派出所主管問我：「上面對你很重視，希望你有困難可以告訴他，一定做得到。」我說：「這樣啊，我沒什麼困難，只缺四百萬，做生意沒錢投資……」他說：「啊！你說這什麼瘋話。」我說：「不然你來做什麼？我告訴你我的困難，上面要幫嗎？我的困難就是這樣，沒其他的，缺錢而已。」他罵我胡說八道，然後就走了。其實我是故意這樣說的。除此之外，桃園縣選縣長、發生中壢事件也找我。

參與中國民眾黨創黨 終因理念不同分道揚鑣

我以前也跟中國民眾黨總裁王忠泉和謝奇他們一起共事過，他們要成立中國民眾黨，宣言什麼的都找我寫，他們也會教我一些方法，告訴我寫的時候該怎麼寫，如果要抓人，就算報上我的名字，管區也不敢來，因為那時候謝奇在，沒人敢動。中國民眾黨，說實話，那是個護身符，我要開罵就拿中國民眾黨當擋箭牌。

之後會離開中國民眾黨，是因為創黨之時我就說創黨後再走入街頭，反對中國國民黨和民進黨，走特別的路，但是他們不敢呀！他們還要向國民黨拿錢，怎麼會反國民黨？到現在國民黨還給他們錢，民進黨執政時沒得拿，但是選舉就有了。因為不走這路線所以我離開了，他們也沒辦法惹我。

王忠泉三個字大家都知道，他是湖南人，情報人員，但是很多事情他不敢小看我，因此他也不敢說我是叛徒。我也是敢說敢做的人，他們如果說錯，我當場開罵，他也拿我沒辦法。我也會跟國民黨嗆，我不曾說國民黨好話。我做事有我的目的，不會精神錯亂，也一點都不會矛盾。

女友堅貞守約 釋放後終結連理

在台北師管區有一個書記官，他是軍法學校比我晚一屆的，因為沒缺而當書記官，他認識我太太的一個同學，是劉衡慶的小姨子。後來他不理我太太的那個同學，我太太替她拿東西來還，要我轉交，我們就認識了，這是一個緣分。另有一次，我跟林順益一起住在牯嶺街，碰巧在艋舺遇到我太太，她問我住在哪裡，我跟她說如果要找我可以到師管區，之後我們約在桃園見面，那時是民國五十七、八年（一九六八、六九年）左右。

民國六十年（一九七一年）我被抓走後她也去看過我，回到生教所時也有來看，一直等到我出獄，我問她為什麼不嫁？她反問為什麼要嫁？她說她等我就好。

後來她才告訴我，我民國六十年被抓，當年六、七月被送回反情報隊時，她有被抓去問訊，問過兩次，問了一整天，都在恐嚇她，問她是否知道我的工作？她回說：「不知道我在做什麼。」她上她的班，我上我的班。

她對我不錯，民國五、六十年時候，在台北逢年過節外地人是沒地方吃飯的，她都會買泡麵來給我或煮給我吃。那時我丈人、丈母娘都不知道，直到我被抓進去。因為她在她阿姨那裡工作，我被抓時，警備總部去找她，她阿姨、姨丈很害怕，就告訴她父母。知道時父母要阻擋也來不及了，我丈人也是很反對中國人，所以說要等就等，出來半年後我們結婚。她就是要等，我不娶也不行。

為了下一代 鐵漢也柔情

家裡有太太維持就好。她一直工作，剛開始是當工廠會計，我請她回家顧店，我在外面跑，她顧店，她也支持我，我覺得我很幸福。有天有個朋友問我生活如何？我說：「沒有人像我這麼幸福的。」他問我太太都不會抱怨嗎？她不會抱怨，支持我都來不及了。站在她的角度，為什麼她支持我，我也不知道，只有一段時間我打算再從事運動，她說：「不好啦，小孩都出生了。」那時小孩還在念國民小學。我本來在正字標記做得好好的，三餐都在外吃，和那些同事常喝酒，可是小孩五、六年級時說：「爸爸成天都不在家……」我感覺到不對勁，才決定要回來做代書。我們那時住永和，我先到吳興街租屋，調查局也叫房東把我趕走，房東起初說有房租可以收，幹嘛把人趕走？後來他問我：「曾先生，你真的是……（政治犯）？」我說：「沒錯。」他才告訴我有特務叫他把我趕走。

我們搬來台北時已經有三個小孩了，他們都在馬偕出生的，搬到永和時，小孩都長大了，讀國民小學了，所以我們拍賣桃園的房子，買下永和的房子。我說我很幸福就是這樣，我沒賺到錢，但是我太太自己持家，所以我說我很幸運。永和我們從民國七十六年（一九八七年）住到八十三年（一九九四年），然後才搬到現在住的地方。為什麼會搬家是因為那時候民進黨都在抗議，我女兒一個讀中山女中，一個讀延平中學，晚上回到家都九點多了，因為民進黨包圍總統府，中正橋過不去。女兒說：「爸爸，外面都在遊行，我回家都九點多了，肚子很餓。」我女兒很乖，也不會在外面吃，都回家吃，我才說這不是辦法，於是開始找房。孩子問我：「民進黨為什麼要抗議、遊行？」我跟小孩們說：「要忍耐，這是對的，不是錯的事，造成

百姓的不便，不是他們要的，是這個政府……。」

松江路的房子買貴了，小間又買了六、七百萬，大家都說我是瘋子，怎麼買得下手？怎麼買不下去，我買到松江路，早上沿途送兩個女兒上學，再送兒子到永和讀書。

我的思想與人不同，小孩要嫁是小孩的事，跟我有什麼關係？還要發帖子讓朋友送錢來給你花？習俗要改的就要改，不要說祖先從哪來，古法是怎樣，我認為習俗都是自己設的，所以我兩個女兒都向她男友說，去公證結婚，不用辦有的沒的，只請自己的兄弟姊妹而已。男方我就不管了，我這邊三、四桌就很多了，不是至親摯友一定沒有，我告訴他們，若我是錯的，講給我聽我錯在哪裡，我可以說明給他們聽。出去外面社會，你兄我弟的，那是酒肉朋友，若要發帖子，一百桌也不夠。

尋求平反 月旦人事

出獄後要復職也不行、要退伍也不行，我要回復原職，他們就是不讓我回復。民進黨的立委卓榮泰，話說得很好聽，也是虎頭蛇尾，我希望以軍官退伍，卓榮泰給我辦到最後，居然要以士兵退伍，我就說：「卓委員，有沒有搞錯？」他說不然聲請大法官解釋。大法官解釋是，如果我要退伍，要立法委員立法通過。³這是什麼解釋？這不是違憲的事嗎？大法官他們沒辦法，要立法院決定，這些大法官沒有用，應該解散。

3 民國九十一年釋字第五五五號。

我也找過陳勝宏，一樣沒有結果。我對民進黨最失望的是王世堅，叫我送了三次陳情書去，他三次都搞丟，說我沒有送給他。我還找周柏雅問，他也說沒有，後來周柏雅送給立法委員徐國勇，徐國勇也看錯。到後來是國民黨的立委陳學聖，他拍我肩膀跟我說：「大哥，一定負責到底，一定讓你軍官退伍。」可惜時候太遲了，一直開協調會，可是改選他沒選上。但是說實在的，陳學聖他們有情，常打簡訊給我，告訴我他現在在哪裡，以後一定幫忙，民進黨的都沒有，讓我很失望，看不下去。

我對魏廷朝評價很高，他真的是一個堅持者，敢和我們接觸、講話。他在桃園埔心的時候，我們那時剛出來，沒人敢接觸，我們去找他也很歡迎，他對那些出獄難友，也希望大家能在一起，但受限於常有人監視，被控制住，我們去，特務都知道，會來問：「你跟誰見面？」我說：「我找誰跟你什麼關係，要懷疑隨你懷疑。」

以我一個身在警備總部原本辦政治犯的人員，自己本身也受到這種迫害，你要相信嗎？證件我還留著，有機會還要去申請，討回公道。對我產生很大困擾，今天我會這樣做，也是他們逼我的，當時陸軍軍法處處長，要調我去東引占缺，他們不放人，今天才會這樣，如果當時到東引去占那個缺，警備總部這部戲就接不到了，這算是命運，還是環境逼我？

爭取台灣獨立 須從理論與基層做起

民進黨會這麼慘，就是大家不體諒、不贊助，樹頭下想當老大，基層也不經營，我很後悔支持民進黨，

阿扁被關這麼久，他們都無能為力。我對阿扁評價不錯，和他接觸時我知道他不是看錢看得很重的人，你說他貪汙，我不相信，阿扁對他妻子，沒辦法，一生虧欠，不敢反抗。我說如果台灣要獨立，站在台獨立場宣傳的這些人，一定要走出去，從小開始教。如果沒從基礎開始灌輸台灣觀念，不用多說，高唱台灣要獨立、綠色的人，都在騙人，只是想當官而已，不是真的要為台灣的土地打拚。

有朋友說辜寬敏他們放棄身段，走下鄉，但是沒人聽，為什麼沒人聽？表示在民主奮鬥中，基層沒有經營。一定要下鄉，從地方舉行各項活動，有心人應該要這樣，現在的人不是，有錢賺就好。少數人影響多數人的方法就是走出去，有錢出錢、有力出力，各出自己力量，別靠民進黨，他們只是想當官而已。沒從基層經營，不用想台灣會有獨立的一天。我日思夜想如何突破這一個問題，但是我沒錢，沒關係，宣傳車開著每天放送，一區一區串連，找出有相同意志的人，才有辦法。像辜寬敏這樣喊沒有用，王獻極的台灣獨立國有做出什麼嗎？建國黨有做出什麼？還不是大家在那裡爭著要當黨主席而已。這些人都接觸過，黃昭堂、台獨聯盟，出一張嘴，如果有能力為什麼不去做？像史明一樣，讓我很欽佩、讓人感動。只是他老了、沒辦法了，要找年輕人繼承他？我想沒有。我希望，真真正正希望為台灣這塊土地打拚的人，自己拿出誠心，從基層改革開始，別老想當市長、當立法委員，那都不是真正為台灣人爭取獨立自主的。

鼓舞年輕人一定有一套理論，台灣獨立有什麼好處？要說出理論，讓人感動，台灣現在有誰可以說出這理論？理論很重要，讓底層跟上層的人去感受，讓有心的人去研究，不要每天談政治，那沒有用啦。一套理論講出來，讓繼承的年輕人知道。大家都說自己是獨盟、建國、台獨，那沒意思，建國要建國什麼？台獨要台獨什麼？沒理論、沒中心，人家怎麼信仰？有信仰才能形成力量，最重要的是這一點，中心的理

論。但是沒有人做呀！史明的《台灣人四百年史》也沒有理論出來，只有一個台灣民族主義，但是什麼叫台灣民族主義？中心在哪裡？我也沒辦法，今天如果我有錢，在活動上就敢找大頭來，問黃昭堂，叫他說給我聽，獨盟，獨什麼盟？找辜寬敏，死硬派堅持台灣獨立是在堅持什麼？理論說給我聽。根本沒有呀！從沒聽他們跟我們說，台灣為什麼要獨立？如何突破這一點，這是最重要的，台灣如果沒有這種人，沒辦法，永遠當別人的奴隸。孫中山建立中華民國也編一套三民主義出來騙人，台灣要建國，有一套憲法，也要想一套主義出來呀！

曾勝賢先生訪談紀錄

時間：二〇一〇年八月三日

地點：台灣游藝會議室

採訪：曹欽榮

錄影：江國梁

時間：二〇一〇年十月十九日

地點：景美人權文化園區

採訪：曹欽榮

錄影：江國梁

記錄：曾咨翔 校對：詹亞訓